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董从林  
编

# 曾国藩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董从林  
编

曾国藩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曾国藩卷/董丛林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0-18704-4

I. ①中… II. ①董…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曾国藩 (1811~1872)-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52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曾国藩卷

董丛林 编

Zeng Guofan J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

规 格 160 mm×230 mm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38.75 插页 2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18 000

20.00 元

---

版权所有

负责调换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 导 言

本书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曾国藩卷》，有必要先对曾国藩其人生平脉络和思想、行事作个梗概性交代，并简要说明本书编选的相关事项。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书，母江氏。其本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家累世为农，既无仕宦，亦无科名，所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sup>①</sup>。靠勤苦治家，至不为贫，从其父辈即有读书条件，到国藩更为家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尽心培养。他也努力进取，不但走通了科举之路，而且终成就为同治“中兴名臣”之冠，在晚清历史上有着重重大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颇受关注的思想文化遗产。

从其读书和科举的历程看：九岁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sup>②</sup>。最初是跟从父亲在家塾读书，后出外就学于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虚岁，下同）上考取生员（秀才），这年里完婚，妻本省衡阳欧阳氏。次年入著名学府岳麓书院肄业，当年报捷乡试，考中举人。道光十五、六两年（1835、1836年）两次会试（后届为恩科）不售，回家愈行发愤准备，有谓其“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sup>③</sup>。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闱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顺性

①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诗文，36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

② 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③ 同上书，4页。

命之理论》得皇帝赏识被擢拔名次，获点翰林院庶吉士，奠定了科举入仕的优势初基。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庶吉士“毕业”）后，曾国藩从最低级别的翰林官做起，后连连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岁时，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隔年，正式任礼部右侍郎。以后数年中，还兼任过几个部的侍郎。总之，他任京官后不到十年间，就“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升至二品大员。这在汉族官员中并不是很多见，连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几分惊异，家书中有“顾影扪心，实深惭悚”、“德薄才劣，何以堪此”<sup>①</sup>之言。

京官期间，曾国藩履职之外，于读书和修身方面亦颇致力，并且是将两者密切结合进行。任初级翰林官时，就拜同为湘籍的当时理学名流唐鉴为师，被教以“读书之法”：专重理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宜熟读”，“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又被告以“检身之要”：“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专一，无杂念）四字”<sup>②</sup>。还被荐以效法同是从学于唐氏的倭仁记省察日记，即经常反省自己，记下“私欲不克”有失检点之处，勉力改之，曾国藩也曾认真遵行。检其当时日记，对诸如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谗浪无节等项多有反省记载。甚至连睡梦中见别人得利而觉羡慕，以及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动这些事情，也不避记出，写下“真禽兽矣”之类的自詈之词。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sup>③</sup>。又曾立“课程”十二条，即（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sup>④</sup> 尽管类似刻板的省察方式曾国藩并未长久坚持，但修身养性的意旨终生不弃，目标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在为学方面，注重理学也是其终身性的，只是并非仅仅胶着于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休养，与精于考据的湖北籍人士刘传莹交流学问，兼取汉学。此后，视野和路径上愈趋开豁。

在为官本职上，京官时期的曾国藩在升迁顺境中更想“锦上添花”，

①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133页。

② 同上书，日记之一，92页。

③ 同上书，日记之一，130页。

④ 参见上书，日记之一，137页。

有抢眼和惊人之举。咸丰元年（1851年）夏间，他向新皇帝激言进谏、险些惹祸之事，即不失为典型事例。此时清朝危机日益明显暴露，太平天国起义已在广西爆发。曾国藩上奏进谏，在“敬陈圣德”而“预防流弊”的名义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琐碎”、“文饰”和“骄矜”之弊。据说咸丰帝览奏大怒，“掷折于地”，欲行问罪，是因有亲近大臣说项方罢，只是在谕中责其奏言“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sup>①</sup>，而未予处分。曾国藩虽有“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说法，但还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侥幸，从中接受教训，在家书中就说，“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sup>②</sup>。他随后所上的奏折，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从标题上即可看出所陈说事情的主题，关注国计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会再有风险。

至于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的生活状况，可以用“贵而不富”四字概括。当时官员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没有地方官那样的“养廉银”，并且曾国藩也属较为清廉之辈。官场常规生活所需以及交往应酬费用，使他常常入不敷出，靠借债贴补。即使他身为部堂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京官赴外省充当乡试考官，公发路费、补贴之外，接受“门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贪腐”的一种惯例，故而一趟试差下来会有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做过一次四川乡试主考官，对改善经济条件有所补益。及至咸丰二年（1852年），又获派充江西乡试主考官，并且这一次还打算在完差之后，绕路顺便回湖南老家省亲，也被皇帝批准。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丧回籍。阴差阳错，由此不但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个节点性转折。

## 二

曾国藩理丧完毕在家“守制”，不久就接到了让他赴省城出办“团练”的谕旨。当时在太平天国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清廷正实施让相关省份兴办团练以配合防御的决策，在籍较高级别的卸任官员，往

<sup>①</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14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sup>②</sup>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190页。

往被选充此等职事。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员，他却借此走上了“移花接木”的练兵之路。当然，所练是不同于当时国家“经制兵”（“八旗”及“绿营”）的湖南“勇营”，也就是通常所谓“湘军”的滥觞。

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有独特的原则、方法。譬如对官弁和兵勇，有着特定的要求条件。对军官，所持条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为根本的是要有“忠义血性”。在曾国藩看来，有了“忠义血性”，那四点也就有随之而具的可能，若无“忠义血性”，其余的则一概谈不上。那么，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员何处寻觅？曾国藩认定，本省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中就是富源。其实，在他出山就武以前，乡人中已不乏书生充当“武将”的先例，像更先出领团练的王鑫、罗泽南等人即是。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曾国藩更看到书生为将的现实可能性，相信让有“忠义血性”的士人来领兵，比那些出身旧行伍、平日骄悍而临阵怯懦的“经制军”官弁要强百倍。那么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条件也很特别，就是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而对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员概不收用。为了便于募集这种理想的兵员，他指示募兵地点要特别注重于偏僻山区，而尽量避开交通便利的市镇和水乡。所谓“选士人，领山农”，成为湘军的一条基本组织原则，体现着曾国藩此番练兵所谓“扫除陈迹，别开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并且，从官到兵逐层私人选置，形成“兵为将有”、层层“私属”的关系，这也是与国家“经制兵”的重大区别。还有，其军费、军饷方面，也不同于官军的完全由国家拨发，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筹，这是与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面。从军种上说，湘军不但练有陆师，而且还练有水师，水陆配合，也是湘军的一大特征。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人力、经费等练兵本身方面外，本省官场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些官员看不上曾国藩当时那种特立独行的派头，故意与他为难。而曾国藩对湖南绿营兵的松懈、腐败气习则很不满，想借机能对其有所矫正。他着力笼络利用一个叫塔齐布（满洲旗人）的原绿营军官，这个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寻常，他想树之为榜样扩大影响。再者，是让绿营参加他勇营的集训。可绿营兵受不了这个约束，更要紧的是绿营军官不容他插手其军越俎代庖，遂与之公开交恶，并放纵乃至教唆部下发难。咸丰三年（1853年）秋季的一天，绿营兵竟成群结队、明火执仗地寻杀

塔齐布，未果之下，又气势汹汹地闯到曾国藩公馆闹事。而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则装聋作哑，即使曾国藩告明后也并不认真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为“退避”计，离开省城长沙而移驻衡州，水师便主要是于此编练。尽管困难重重，但曾国藩发奋而为，终有所成。

至咸丰四年（1854年）春间，所练湘军正式所谓“建旗东征”，投赴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这时其军规模，陆师十营，水师十营，连上随军夫役，共有一万七千余人。出征之时，曾国藩发布题曰《讨粤匪檄》的文告。其内容很有特色，基调不在于声讨“粤匪”反清作乱（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而最主要是从“卫道”的角度立论。除了污蔑太平军如何残暴外，特别强调的是它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说这不仅是“大清之变”，更是“名教之奇变”。显然是要最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特别是号召“读书人”起而投身镇压“粤匪”的行列。

湘军出战后，并没有立马显出《讨粤匪檄》中所谓“大兵一压，玉石俱焚”的威力，从其最初几年的战况看，可谓有胜有负，胜少负多，并且有时败得很惨。像出战不久的当年四月间，在离省城长沙不远靖港地方的战事中，曾国藩亲自督率之部便遇敌大溃，他下死令都没法遏制，自己羞愤难耐之下竟投水自杀，是被随从救了起来。返至长沙后他还是执意不活，连遗折都写下了，只因在湘潭的湘军另部捷报传来，才了却一死念头，重新振作起来。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夺下湖北武昌、汉阳的胜利。咸丰皇帝接报高兴之下，有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之命。据说，时有大臣提醒，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sup>①</sup>！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这样被提醒之下，咸丰帝遂即收回成命，令曾国藩带兵东下作战。湖北巡抚之职，在排除由曾国藩担任后，所用的自是非湘系人员，但任者无法控制局面，变故多生。至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改让曾在曾国藩手下为部将的胡林翼担任（先署理，次年实授）。胡林翼也是一大干才，把湖北经营成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对湘系群体还是曾国藩个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国藩未获署理鄂抚率军东下后，先是在鄂、赣交界地区的田家镇（属湖北）一带获胜，随后于当年十二月（1855年1月）在江西湖

<sup>①</sup>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2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口战役中则遭受惨败。其水师被太平军分割成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个部分，不能相互援应。太平军抓住战机，巧攻猛袭，致其损失惨重，连“大帅”座船也被俘获。曾国藩既愤且惭，又不止一次地要寻死，被人劝止。此番也许做做样子的成分不小，并不像前次那样真心，但其因战败而深感窘迫羞愤显而易见。

曾国藩移驻江西后的磨难，远不止是军事上的，更有清朝阵营内部的斗法。他率部在该省数年间，处于“客寄虚悬”的地位，相当难堪和被动，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困厄的一个阶段。按照他向清廷上奏中总结的此期“艰难情状”，有这样三大方面：一是部下在升迁补官方面受巡抚和提督的排挤，自己却无能为力，“虽据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提督和总兵的合称）”。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层层相属，自为一体，大都把他曾国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办起事来呼应不能灵通，特别是筹饷之事，更处处受到阻挠。自己说话，州县不肯听从，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关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换，让人怀疑，屡次发生有部属被羁押刑辱，而他出示印札无效的事情，甚至连给人发放的收捐凭证，地方上都不予承认。在另外言论场合，他甚至有“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sup>①</sup>的痛说。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军中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这似乎为他摆脱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向朝廷奏报丁忧并请求开缺后，不等谕旨批准，就弃军回籍，并接二连三地要求在籍守制（军务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规之制的）。他这样做，表示重孝之外，更是要借机向清廷表明在军之艰难（上面述及的“艰难”三大方面，即此间奏言）而要挟地方事权。朝廷鉴于当时江西军情不是特别急迫，便来个顺水推舟，允准他暂时在家守制，使得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筹谋落空，有苦难言。舆论上则不但对他不予怜悯，许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也对他颇有微词。不要说政敌之辈，即使湘系同党人物左宗棠，对他也大加责难。这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是个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国藩颇感恼火，两人因此交恶，甚至到了“不通音问”的地步。

此番曾国藩在籍期间，是他心理上备受煎熬的一段时日。他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

<sup>①</sup>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诗文，156页。

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来，简直是显出一种病态。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真的在籍“终制”，由于同党要员（特别是胡林翼）的帮助和前敌军事上的需要，清廷在咸丰八年（1858年）夏间终于让其复出。由此，曾国藩改变了官场处事策略。就复出之事本身而言，可谓毫不拖泥带水，没有半点讨价还价，闻命即行。路过省城长沙时，便主动面见左宗棠以示和解，还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氏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与非湘系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并对此非常看重也颇觉有效。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sup>①</sup> 更后他还曾总结说，改弦易辙后他“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并具体解释，“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sup>②</sup>。看来，在官场人际关系调节方面是真的收到了效用。

### 三

就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阵线格局而言，自曾国藩复出之后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他复出当年之秋，扎于扬州的江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摧毁后未再复建（其第一次被攻溃是在咸丰六年即1856年春），特别是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春夏之交，扎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城下的江南大营亦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本有此江南、北大营两相配合，清廷以之作为其军事要图，是想让湘军在上游地区承担艰危，而让其“经制兵”收取拿下太平天国都城之功。至江南大营此时彻底覆灭（它在咸丰六年夏也曾被攻破过一次而重建），使清廷靠其收功的企图落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不得不把全战线对湘军开放。同时，也不好再以不给

①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400页。

② 同上书，家书之二，476页。



曾国藩地方事权、让他军政分离来进行限制，终在这年四月间让其署理两江总督，六月间便告实授，并让他以钦差大臣统理相关数省军务。这是曾国藩个人政治生涯和湘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其个人权势得以显赫起来，湘系群体势力也由此很快走向峰巅。

曾国藩的走向疆吏之路可谓曲折。除前述署湖北巡抚未果之事外，咸丰九年（1859年）间，借有朝命让其带兵入川，胡林翼还曾为之着力谋取四川总督之职，结果也未如愿。唯恐其没有督符入川孤危致败，又只好设法争得免其入川而留下来合力“图皖”。总之，不给曾国藩督抚之权，仅让他带领湘军打仗，这是清廷多年间控制曾国藩和湘系的重要策略。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需要，又注定它不能不向曾国藩开放疆吏职权的闸门。当然，曾国藩获职江督后，还有一个为时多半年的困厄阶段，这主要倒不是由清朝内部的明争暗斗造成，而是由于其本人战略决策失误，又刚愎自用不听别人劝告，执意进驻皖南祁门而陷入“绝地”所致。有说他此间“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以至于长悬利剑于帐中准备随时自刎。不过，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四月间移出祁门后，其处境便随之大为改观。况且，一直有胡林翼的支撑、配合，胡在湖广，曾在两江，地域上连成一片，两人密切协同，对湘系势力来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局面。

以“以上制下”之势沿江推进是湘军最基本的战略方针。敌对双方在沿江特别着力争夺的几大据点，自上而下顺次是武汉、九江、安庆，再下就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了。曾反复易手的武汉，自从咸丰六年（1856年）间被胡林翼指挥夺取，太平天国方面就未能再夺回。九江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间被湘军攻下的，这主要也是由胡林翼指挥完成，当时曾国藩正借丁父忧弃军在籍。而太平天国方面丢失九江之后，安庆就成为其从上游屏蔽天京的主要据点。

出任两江总督后的曾国藩，特别是在他脱离祁门之困以后，最主要致力的，就是与胡林翼共同部署和指挥安庆战役。安庆，作为“金陵之门户”，不管是对于太平天国还是清方来说，其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sup>①</sup>。其弟曾国荃，作为“出道”有年的湘军一大悍将，担任的是率部进围安庆的任务，其间尽管事变多有，但他坚持不摇不动。就此役部

<sup>①</sup> 《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家书之一，604页。